

年终专稿

2024 我们一起留下的足迹

静水流深时，身处“水面”下的个体往往才是时代的风向标，也是时代的预言者。2024年，我国高等教育度过了深刻调整的一年，高等教育领域的每位老师、每名学生都成为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高等教育过去与未来的“结合点”。

正因如此，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国科学报》将关注高等教育的视线更多聚焦微观尺度，报道老师和同学中值得关注的探索与选择，与他们一起拓展高等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并产生了良好、热烈的社会反响。时值年终岁末，那些“新闻主角”过得如何？对于自己曾经的故事和未来的打算，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反思与畅想？



赵鼎新

这一年，我过得「心安理得」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原系主任赵鼎新来说，即将过去的2024年无疑是记忆深刻的。

今年3月，他辞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事件曾引发广泛关注。但热潮终有退去之时，彼时，他的妻子正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访问学者，离开公众关注中心的赵鼎新选择作为“家属”前往德国。

“有半年时间，我基本待在德国，其间完成了几篇文章和一部书稿，也作了几场报告，那段时间过得很平静。”赵鼎新说。

这样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到年底，但赵鼎新仍是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回国后的他仍需面对研究院的很多工作，有些工作甚至并不局限于研究院范畴。

回顾即将过去的2024年，他向《中国科学报》直言，这一年他过得“心安理得”。

“应该说，不止这一年。从决定回国从教至今，我的想法都没有变过——为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尽一份力。”他说，“如果我不这样做，会觉得遗憾；但如果努力够了，即便没有成功，我也心安理得。”

不管结果如何，至少这段时间的观察与经历，让赵鼎新对于目前国内高等教育有了一份新的认识和思考。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也不管是大学还是教师个体，其发展都要经历很多挫折与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高校内部出现某些判断、程序和决策失误再正常不过。”赵鼎新说，关键是当意识到问题所在时，是不作为，甚至遮遮掩掩，还是积极寻找对策，及时止损。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职时，有件事让赵鼎新印象深刻。某年，他所在的研究中心要给博士生分配奖学金，由于各种原因，四份奖学金全分给了文科类学生，社科类学生无一人拿到。意识到问题的赵鼎新马上提出问题，要求纠正错误。此后，中心的一位老主任前来与他讨论解决方案。双方开始时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但当该教授意识到赵鼎新并非想推翻今年的决定，而是希望有一个更完善和公正的决策机制后，马上和盘托出了他的评审程序修改方案。“问题就在一次讨论中得到了解决。”赵鼎新说。

“奖学金已通知到了学生，重评会带来很多问题。此时纠结问题本身会带来很大麻烦。”赵鼎新说，这位老教授显然也知道评审有问题，否则他不会马上提出新方案。但他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儿，因此就有了开始时的争论，但当他察觉到我所寻求的并不是让中心“丢丑”，而是一个补救和止损的方法时，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

“承担责任和寻求妥协，这是很简单的思路。然而，我们在遇到具体事情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规避错误和推卸责任。”赵鼎新说。

2024年对于赵鼎新来说并不寻常，对于他所任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频频传出的国内外名校撤销人文社科类课程的消息，给很多人留下了“人文社科式微”的印象。

对此，赵鼎新并不赞同。

“部分国外名校之所以裁撤人文社科类课程，并非缘于其课程本身，而是有很多客观原因；至于国内，人文社科的发展潜力应该说更大。”他解释说，目前国内理工类学科处于大发展阶段，但事实上，自然科学的创新往往都源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类学科的发展。我们在一些领域缺乏原创的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人文社科方面缺乏能产生广泛影响的创新思想。

“人文社科学者不能只盯着可以带来短期‘效益’的‘短平快’项目，而是要真正思考我们的社会发展究竟需要解答什么样的人文学科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学术，才能真正有所建树。”赵鼎新说。

赵鼎新说。

樊建平

我坚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王之康

2024年，正式“去筹”的深圳理工大学迎来了首届本科生，学生质量也进入了广东高校第一方阵。这让作为校长的樊建平深感欣慰。

在成为校长之前，樊建平一直在做科学研究以及科研管理工作，脑子里想的是如何争取和完成科研项目。而如今，他的脑子里装的却是自己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当前，全球高等教育正步入第四类大学的转型期。这类大学的核心是从传统的科研、教育与成果转化，转向使命驱动、问题导向、多主体协同创新为一体的新型高等教育范式，着重于创造社会价值并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樊建平说，他们希望把深圳理工大学建设成为第四类大学，“因此和市场及产业结合得非常紧密，同时与科研机构进行密切合作，在本科教育上进行了一些创新”。

比如，该校实行“学院+研究院+书院”三院一体的协同育人模式，学院开展以学科知识为核心的教育教学，研究院通过科研平台为实践教学提供支持，书院则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养成；本科生从大一一开始，每个星期只上4天课，周五全部去实验室进行科研实践等。

一名叫肖逸朗的学生让樊建平印象深刻。“他告诉我，通过科研实践，不仅亲眼看到了师兄、师姐在研究什么、怎么研究，还能亲自动手，提前感受研究过程。”樊建平说，一次在合成生物自动化小组进行科研实践时，肖逸朗没能把目标基因导入大肠杆菌，导致实验前功尽弃，但这次失败让他明白，在科研中，实验失败

是很正常的，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教训，一步步走向成功。

再比如，该校也为本科生匹配了很多大师资源，还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图灵奖得主等学术大师与本科生面对面。一名学生在和诺奖得主斯特凡·黑尔交流后说，自己“离诺奖又近了一步”，这句话令樊建平记忆犹新。

“创造力=知识×(好奇心+想象力)，我们最想培养的是同学们的创造力。”樊建平告诉《中国科学报》，深圳理工大学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将面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需要，以交叉学科来培养优秀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创新企业家等拔尖创新人才。

他说，我国已建成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公众对其接受程度很高。将来，类似学校或许会更多，只是每一所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彼此间互相借鉴，为更多高校的建设发展提供参考。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稳扎稳打，先让2025年全国招生工作得到更多省份认可，再建立科研的框架和基础，共同支撑一流学科发展。此外，我们还将继续面向全球招聘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樊建平说，经过一年左右的实践，希望他们的教育体系能够成型，并在服务理念和服务效率上更进一步，打造“服务铁军”。

“给深圳理工点时间，我坚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樊建平说。

樊建平说。

李志春

先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生李志春因为“反卷”，主动选择去一所民办二本高校当老师，终于活出了自己想要的人生。

李志春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9月，他的故事经《中国科学报》报道后广为传播，甚至远在印度、美国、埃及的朋友都纷纷跟他联络。最让他开心的是，不少他带过的已经毕业的学生也给他留言，分享他们的认同和喜悦。

时间拨回到2016年，李志春所作的选择绝对是“非主流”，但如今，名校博士就业不再追逐“名校”的趋势已经显现。学历贬值、就业压力剧增，连很多职业高校招聘博士毕业生的数量也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李志春看到，随着大量民办高校转为公办学校，许多普通地方高校正加速走在“卷”的路上。“这些学校先天不足，没有大平台、大资源，再加上财政资金紧缩，有的学校甚至要求教师拉更多横向课题，拉不到还会扣绩效。这完全是瞎搞、赤裸裸的‘学术内卷’。”

除了缺乏资源，普通高校的科研氛围与名校也有很大差距。不过，这对从来不爱“学霸圈”的李志春来说“并不是事儿”。

“我不混迹圈子文化，那里很多人势利得很，我就喜欢和能‘玩’到一起的人交朋友。”李志春说，“至于做科研，这是我的事情，与周围人无关。在这样的学校，专注科研可能不被人理解，但我享受这种‘孤独’。”

事实上，这种“孤独”并不意味着单打独斗。李志春解释说，目前的科研模式，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都要依赖一个好的团队。只不过，这个团队并不局限于自己所在的学校，更像一种合作网络。

“当你在学校学习做科研时，就已经在自己感兴趣的科研方向上寻找学术共同体了。你可以通过学术会议、发表文章，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前辈，并努力融入这个网络。”李志春说，无论选择哪所学校就业，只要坚定自己的科研目标，就可以通过网络寻求交流合作。

“但前提是，你首先要向这个共同体，尤其是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们认可了你的价值，团队就会主动找到你、帮助你、给你资源。”李志春说。

一些人可能会误解，像李志春这样选择“二本”高校就业便意味着“躺平”，其实不然。“我只是换一种方式努力，换一种方式让学术变得更加纯粹。这种纯粹会给予我更多时间成全自己。”李志春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我们处在一个很‘卷’的环境里，就会渐渐失去热情，不想钻研，甚至抵触这个学科。但如果换一个环境，也许你对这个学科更加热爱，追求细水长流、厚积薄发。这才是一个真正做学术的生态。”

李志春说。

吴瞳勃

融合批判性思维，关注我的人变多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9月，云南农业大学开设的全球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迎来了首批100名新生。

这个学期恰逢咖啡采收季，该校热带作物学院教授陈治华等带着学生到农场开展咖啡专业认知学习。其间，所有人都很兴奋。“我们在农场比赛采摘咖啡鲜果，同学们都参加了，主办方还当场宣布了大赛名次。”陈治华回忆道。

首届学生的高考成绩比陈治华预想的高。不少学生的成绩高过二本线七八十分，甚至有学生达到了一本线。一名河北考生就是如此，他对咖啡充满了兴趣，并最终凭着兴趣选择了这个专业。“00后”学子的选择让身处偏远城市普洱的陈治华很感动。

在他们身上，陈治华看到了年轻人的活力，以及专业发展的活力。

“现在大家‘玩’咖啡的内容更丰富，从前我们几个老师埋头科研，现在有了年轻学子加入，创造力更多了。”陈治华告诉《中国科学报》，精品咖啡如何控制风味、无水加工如何保证咖啡品质……有的方法教师很难想到。有了一群热爱咖啡的年轻人参与其中，推进速度很快，成效也不错。

陈治华和其他老师有时也会畅想，“00后”学生的外语好，学业上肯下功夫，“希望部分学生将来能走学术道路，考研、读博、出国留学，把咖啡科研做到顶峰”。

课后，年轻学子的思维活跃。他们在校内开咖啡馆，最近又有新咖啡馆开业，引来师生捧场。他们还制作了各种咖啡小零食，参加企业举办的创新创业大赛。不久前，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还在比赛中捧回了金奖。

陈治华

迎来首届新生，我变「年轻」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看到专业发展生机勃勃，陈治华有时会忍不住嘴角上扬。“很多师生跟我开玩笑说，这段时间你工作虽辛苦，但感觉比从前更年轻了。其实我是心情愉悦，工作劲头更足了。”

陈治华告诉记者，这还得多谢《中国科学报》对全球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报道。“现在学校在对对外宣传中所引用的数据、事例大多来自这篇文章。”

“首届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招生让专业有了人才支撑，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没有本专业人才，我们即便高一辈子咖啡研究，心里也会失落。”陈治华说，“有了专业，又会聚了一批对咖啡充满喜爱、勤奋刻苦的学生，让我感觉很有盼头。”

陈治华说。

吴瞳勃

融合批判性思维，关注我的人变多了

本报记者 温才妃

今年7月，在全国高校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教育研讨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吴瞳勃关于“课题组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培养学生”的发言引发很多人的关注。

在吴瞳勃的课题组中，从成员选拔到论文写作，本科生的科研训练全过程都用到了批判性思维。他用批判性思维路线图指导学生寻找科学问题，提出科学假设，进而制定实验方案，再用实验进行验证、评估，得出最终结论。

“面对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可以使用批判性思维工具——二元问题分析法，把大问题分解成小问题，找到关键要素，进而设计实验进行验证。”吴瞳勃举例道。

2024年，吴瞳勃收到了很多学生的积极反馈。2019年首批加入课题组的本科生张家瑞和周致远，今年刚开始博士后研究就获批了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他们认为，比起知识性训练，在课题组学到的批判性思维训练可以持续发挥作用，解决研究中不同的问题。

吴瞳勃没有想到的是，“作为一名将批判性思维融入科研的青年教师，今年关注我的人一下子变多了”。特别是今年9月，他的经历被《中国科学报》报道后，多个学校、学术机构邀请他去作讲座。

怎样用批判性思维的工具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是很多高校关心的问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是科研实践教育，特别是让本科生走进实验室、走进课题组、走进科研团队。运用好批判性思维可以解决学生‘无问题、无想法、无论证’的‘三无’问题，帮助本科生做好科研。”吴瞳勃说，讲座中大家都非常认同这个观点。

批判性思维还要与学科、专业相结合。今年下半年，吴瞳勃和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俊军一起为该校药学院大一新生讲授“无机化学”课程。他们对课程做了整体调整，引入讨论课，选了16个与无机化学和药学相关的主题，把学生分为16个小组，每个小组做一个主题汇报。

“我们用批判性思维的‘三大启动问题’——这是什么问题、有真的理由吗、还有别的说法吗，帮助他们构建主题讨论框架，设计汇报内容。”吴瞳勃告诉《中国科学报》，学生觉得这种学习方式更明确，否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收集信息，以及收集信息后怎么展开表述。有不少学生认为“三大启动问题”深入人心，甚至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

吴瞳勃说。

杜素娟

年轻人，请尽情释放你们的欲望

本报记者 胡珉琦

如何理解当下大学生的困境和痛苦？2024年，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教授杜素娟因为对“断亲”“成长”等年轻人关注的切身议题有深入理解，并给予他们支持，被他们亲切地称为“网络妈妈”。为此，围绕大学生成长、成才话题，《中国科学报》特地对她做了专访。

这一年里，除了接受媒体采访，杜素娟还受邀参加了一些节目，这些都使得她在B站发布的视频观看量越来越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她说说自己“诉苦”的学生确实多了很多。

“但很多时候，我感到无力。”杜素娟说，“我觉得自己做的都是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只能暂时缓解学生们的‘疼痛’，却解决不了根源性问题。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在想：我究竟能帮他们什么？”

在杜素娟看来，许多年轻人看不清的痛苦、焦虑的根源来自一个荒诞的现实——如今，社会文化、网络文化肆意播撒“绩优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激活了年轻人太多不恰当的欲望，进而把他们裹挟进了一个永远无法企及、且对自己造成伤害的“陷阱”。然而，当社会资源枯竭，根本无法满足年轻人的欲望，并造成他们焦虑、抱怨的时候，一些年长者或享受了时代红利的人又出来“训斥”他们，对他们说“你的欲望太多”“你不要抱怨”。

“绩优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用有限的选择、模式来定义成功。这本是少数精英的目标，但现在它是泛滥的，并全面渗透进我们的教育体系、家庭文化，甚至是同伴竞争中。”杜素娟直言。

然而，欲望是一个人的能量来源，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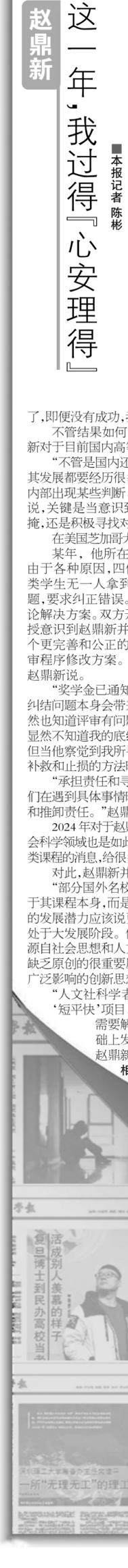
有欲望就没有创造力，就不会有激情，更不会求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告诉我们，如果人类没有了欲望，文化将无法发展。”杜素娟说，年轻人，请尽情释放你们的欲望。这个欲望应该是恰当的，是合乎每个人自身价值追求的。”

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谚语。杜素娟说，人们只知道道路千万条，但罗马还是那个罗马。

“事实上，有千万条道路，就有千万个罗马。”杜素娟用教育做比喻，“我认为真正的教育就是让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他们用整个一生去探索自己的罗马，像搭积木一样搭建出自己的罗马，而不是一味奔向那个别人羡慕着、仰望着的罗马。”

那么，什么是属于自己的“罗马”？“这样的罗马就是能让你独立生存，且能得到精神愉悦，这就是全部。它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难。”杜素娟希望年轻人勇敢起来，不被社会情势所恐吓、诱惑，有痛就喊痛，不认同就拒绝，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

杜素娟说。



《中国科学报》第4版